

愛國學人晏陽初(上)

——點燃平教鄉建之火(本文插圖刊第10、34頁)

● 晏鴻國 撰文 · 晏明 校訂

到港讀書赴美深造

自一九一八年在法國戰場教華工識字到一九九〇在紐約逝世，晏陽初先生致力於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共七十二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裏，有幾多艱難曲折，又有幾多榮辱興衰，是什麼支持他含着眼淚，咬着牙關從中國幹到世界幹；是什麼鼓舞他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矢志不渝地為勞苦大眾服務？是他對勞苦大眾深沉的摯愛，是他對祖國的拳拳忠誠。晏先生以平民教育蜚聲世界，而平民教育又發端于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因此，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可敬的愛國者。晏陽初的愛國主義思想，早在孩提時代就埋下了種子。他幼入私塾，習誦「四書五經」，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觀念，使他早年就有了「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壯懷。他曾說：「我自幼心高好強，具有治國平天下的豪氣，平民教育，鄉村改造，都是放眼世界的運動，和我小時的理想，可說是殊途同歸」。有一件小事，看來似少年的幼稚，實際則表現了陽初的雄心壯志。在保寧(今四川閬中)讀書時，陽初不

過十多歲，功課之餘常與同學登高遊江，「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同學們見陽初平時操練施起口令來精神抖擻，有板有眼，說他是將才，將來「可做楊遇春第二」，并從此把他叫「遇春」。(楊遇春，四川崇慶人，清時名將，多次勇立戰功，官封昭勇侯。陽初也極崇拜此人。)他那時的思想正處於欲救國而不知從何着手的矛盾狀態，同學們的善意推許，觸動了他的志向。因此，他便真的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晏遇春」，直到一九二一年方改用原名。

一九二二年秋，晏陽初在友人的支持下，出三峽，赴香港、美國求學，幼年時埋在心中的愛國主義種子，在這段時期得到催化。在香港、美國的所見所聞，使他看到了祖國的衰弱，民族的苦難，增強了他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救國救民的使命感。「在香港，我時有比較中西文化和社會的機會，更親體國勢衰微的種種悲哀。西人的優越感，及國人的自卑感，隨處可見。我至今記得，一星期日，我步入一座堂皇的教堂，等待引座員領我入座。他看了我一眼，却去招呼站在我後面的一個衣着體面的白膚男士。我轉身走出教堂，

從此不再去」。尤其值得一提是晏陽初在香港讀書時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初發第一炮」。一九一三年，晏陽初進香港聖史梯芬孫學院學習，他用半年時間補習了中學的數理化課程，九月便去報考香港大學。考前聖史梯芬孫學院的校長說他是白花十塊錢的報考費，可一俟揭榜，他竟考了第一名。按該校的規定，考第一名者可獲英皇愛德華第七獎學金一六〇〇元。這對當時像晏陽初這樣的窮學生來說，不啻給予一筆天文數字的財富，可是當校方告訴他須改換國籍做英國國民才能得到這筆獎金時，他昂首朗聲地說：「這代價，要一個中國人來付，太高了」。他毅然決然放棄了這筆獎金，表現了一個中國人高尚的民族氣節。就連當時港大的校長對此也深表敬佩。當時港大開設工科、商科、文科。晏陽初選擇了其中最冷清的文科，攻讀政治經濟學。據他自己解釋說：「香港的環境和個人的經歷，使我深體國弱民貧的悲哀，如何育民，富民以爲強國之本……要想負起改造中國的責任，必須具有政治和經濟學的基本知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救國與救世都是義不容辭的事，因有此心，所以探索尋求

方法，這是我讀政治系的基本原因」。

一九一六年，晏陽初橫越太平洋，赴美國耶魯大學深造，這段時間的經歷，使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日趨成熟。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在川中時，只有抽象的民主觀念，到香港後，敗國之民的羞辱，促進了民族意識的發生，我開始深切體會到國之重要，已有改造社會的願望。再進而看到美國的繁榮安定，華裔工商的屈居人下，又回到祖國的貧愚落後；我比較三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孰高孰下，優劣如何……，我不忍想像在中國的土地上再出現香港式的殖民地，苦難的中國，需人解救，我立志貢獻己力」。基于這些想法，他參加了中國留美學生的秘密組織「成志會」，青年們：衆志成城「思圖救國」。當時正值美國排華運動加劇，許多華商一到美國就被拘禁，就是久居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華僑也常被無理拘禁。眼見這些不平之事，晏陽初心裡既氣憤又難過，為表示對美國政府排華政策的反對，他以「從美國憲法論排華的不合理」為題，參加耶大的演講比賽，以一介書生所能盡的最大努力，表達了他對祖國的深切的愛。在準備演講的過程中，他不斷地反思，弄清了華人之所以被人看不起，那是因為中國是個「連年戰亂，列強瓜分，軍閥亂政，民不聊生」的弱國，弱國自然不能與強國同立于平等地位。華僑無富強的母國撐腰，自然就要受氣了。因此，他更加努力奮發，以達到要治本，要自強，謀求真正的平等之道的目的。

前往歐洲戰場服務

在晏就讀的耶魯大學的校園裏，有一美國獨立戰爭時的民族英雄內森黑爾的銅像，校方常以此對青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內森黑爾的名言：我唯一感到遺憾的是「我僅有一次生命可以貢獻給祖國」。深深地銘刻在晏陽初心中。後來，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曾多次以內森黑爾的事跡教育青年。一九一七年，美國對德宣戰。一時間，美國朝野沸騰，同仇敵愾。各行各業或支援軍備，或從軍捐款，這種舉國一致的愛國熱忱，對晏陽初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一影響，導致了後來平民教育中的「公民教育」這一重要內容的產生。）當時中國派遣了二十萬名華工在歐洲戰場服務，由於習俗不同，語言不通，華工與英法軍官之間常常產生許多誤會。基督教青年會戰時工作會便號召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去歐洲戰場為華工服務。晏陽初在愛國主義精神的促使下，毅然投筆從戎，在畢業典禮後的第二天，便踏上了去法國戰場的征途。

教育華工讀報識字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晏陽初終身奉行的堅定信念。他的愛國主義思想集中表現在他對人民大眾的熱愛。早在他赴保寧上學的途中，他便對勞苦大眾的「苦」有了一定的認識。日與背鹽的「背二哥」結伴而行，夜則同宿一店，勞動人民的痛苦與堅忍給了他很深的印象。及至在法國戰場與華工們朝夕相處一年，他便發現了一種新人——即蘊藏着無限智慧和能力的廣大勞動人民。從此，晏陽初的愛國主義找到了一個着落點

，勞動人民對他的啓示與教育，使他的愛國主義升華到一個嶄新的境界，立志回國以後，不做官，不發財，把他的終身獻給勞苦大眾。

一九一八年夏，晏陽初來到法國北部的布朗地區，為那兒的五千餘名華工做翻譯、傳達。英國軍官看不起華工，把華工叫做「苦力」，并常常虐待華工；晏陽初對此氣憤不平，曾多次向英國軍官提出抗議，并萌發了教育華工，組織華工以發揮中華民族無限威力的念頭。華工們遠離祖國，思鄉之情甚濃，有人求晏代寫家書，晏樂而為之。可後來求寫信的人越來越多，有時一夜竟有幾百人排隊等候。於是，晏陽初辦起了識字班教華工識字。第一期識字班共有學員四十人，每晚學習一小時，四個月後，竟有三十五人能寫信了。華工們學習時很刻苦，有時一天幹了十二個小時的活以後，下工回來連飯也顧不上吃，先趕去學習。華工們向學的精神，給了晏陽初一個承先啓後的動機和機會，他說：「表面上是我在教他們，實際上是他們在教我，給我指點了一生的方向」。華工的識字活動，點燃了後來燃遍世界的平教鄉建的熊熊大火。

巴黎和會爭回面子

隨着識字華工的增加和課外閱讀的需要，晏陽初創辦了《華工週報》。該報對加強華工的社會意識，提高華工的民族覺悟，啓迪華工的知識能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從當時舉行的徵文比賽的一些題目，便可看出它的思想內容的進步性和革命性。如《華工在法國與祖國的損益》，《什麼

叫中華民國，中國衰弱的原因，民國若要普及教育，你看應當怎樣辦才好。特別是當《華工周報》報導了膠州問題，中日密約後，華工們羣情激憤，紛紛投書《周報》，以激烈的言辭譴責日寇的侵略，踴躍捐款支持祖國抗日。有的華工營還成立了「愛國自治會」、「救國儲金團」。有一部姓華工捐出五五〇法郎托我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轉呈政府，還有一名華工把他三年所存的三六〇法郎捐給《華工周報》，并寄去一封信說：「晏先生大人自從您辦周報以來，天下的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報賣得太便宜了，只十個生丁，恐怕不久就要關門。我現在捐出我三年的積蓄，三百六十五個法郎」。通縣一名華工回國後，孜孜不倦地研究一項機器製作，他說他這樣做不是爲了個人金錢利益，只是對晏先生辦的《華工周報》呼籲的一種反應。特別值得大書特書的是華工們在歐洲戰場的英勇表現在「巴黎和會」上爲國爭光的事迹。在「巴黎和會」上，英法各國代表侃侃而談本國在戰爭中的功績。輪到我國代表發言時却無話可說。後來中國代表王正廷找到晏陽初，晏爲他搜集了華工在戰場服務所得的獎品、獎狀，戰地傷亡的記載與照片，以及幾次在英法軍隊危急時，華工衝上前線擊退德軍的事迹和因此而得到的大批鐵十字章。中國代表得到這些材料後，才得以在會上列舉事實，據理力爭，使中國多少挽回了一些利益。

夫唱婦隨博士下鄉

「定縣實驗」時期的「博士下鄉」，是晏陽

初先生用愛國主義精神團結廣大知識分子的典型範例。自新文化運動開始以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覺醒。他們痛恨于袁世凱統治下中國的黑暗和混亂，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尋求救國強國的道路。深沉的憂患意識，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歷史使命感是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的羣體意識，「博士下鄉」的口號就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中提出來的。幾十名高級知識分子和幾百名大學生，能够離開城市優裕的生活，拋棄高官厚祿，心甘情願地到條件十分艱苦的農村與「泥腿佬」爲伍，的確是難能可貴的。這一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壯舉，其意義遠遠不只是地理上幾百里路的轉移，而是時間上十幾個世紀的超越，它標誌着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與傳統官本位封建意識的徹底決裂。這些知識分子之所以能深入農村，長期堅持并有所作爲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平教運動本身的吸引力和晏陽初先生一心爲平民的真情實感和崇高的獻身精神的感召力。

一九二九年七月，晏陽初夫婦攜三子二女，舉家遷往河北定縣。晏先生除領導整個實驗區的工作外，還親到翟城村小學任教。晏先生的夫人許雅麗，是美國華僑，生于美國，長于美國，回國後也只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居住，現在一下子來到河北定縣，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差異所導致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可她并不以此爲苦，而是盡量做一些工作支持晏先生的事業。如協助接待來定縣參觀的國際友人，組織平教會同事的家屬成立「家庭會」，每周聚會一次，由許雅麗女士向她們介紹衛生保健知識。

平教會的這批高級知識分子大都是留學歸來的各方面專家，有大學校長、教授、作家、畫家……他們來到定縣後，脫下西裝，住進泥屋，深入農村，認識問題，協助農民解決問題。由于他們艱苦細緻的工作，定縣的政治、經濟、文化、衛生及工農業生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他們也對定縣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有的還與定縣農村的姑娘結爲終身伴侶。十年定縣苦，不負有心人，他們終于創造出以「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爲主要內容的「定縣經驗」，今天，「定縣經驗」已推廣到亞非拉五十多個不同國情的國家和地區，其適應範圍之廣，其生命力之強，與平教會當年這批「第一等的人才」所創的「第一等的計劃」，所做的「第一等的工作」分不開的。

當年的定縣不僅吸引了一大批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連外國友人也吸引來了。美國專家甘博曾協助平教會進行社會調查。美國女大學生金淑英（中國名字）遠涉重洋來到定縣，穿粗布，住泥巴屋，先後兩次在定縣工作達三年之久。「博士下鄉」的口號不僅當時名噪一時，現在仍被廣大第三世界的青年們所推崇、仿效。印度「甘地——晏陽初鄉村改造中心」的負責人雷迪博士，因受晏先生的影響，決心發起印度的鄉村改造運動，爲解決開辦經費的困難，他賣掉家裏的地和妻子的首飾。菲律賓許多大學生畢業後都願意到農村去工作，現任菲律賓國際鄉村改造學院院長弗拉維爾博士，謝絕當衛生部長的聘請，投身鄉村改造事業，并將這種精神傳給他兒子，讓他兒子當鄉村醫生爲農民服務。（下期續完）